

**Interven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ld War in Malay  
and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1950-1969)**

Chong Fah Hing

**冷戰在馬來與馬華文學場域的介入與  
衝擊（1950-1969）**

莊華興

非常感謝多位匿名審查提供的寶貴意見。受疫情影響，馬來西亞大部分資料館在這期間閉館而無法進一步查閱。不盡善處，有待他日補充。

莊華興，馬來西亞國立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學程副教授。

聯絡方式：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43400 UPM Serdang, Selangor, Malaysia.  
/ fhchong@upm.edu.my。

## 摘要

戰後1950、1960年代見證了英帝國勢力的衰退，喚醒了馬新兩地各民族獨立建國的願望，中共勢力的崛起進一步使南洋華人分裂成擁共與擁蔣兩派。馬來族群在此時追求的是民族主義建國。在各種勢力的衝擊下，英殖民政府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不得不把權力下放給各民族右翼分子，左翼分子視之為新殖民主義，再次展開鬥爭。當美國於1949年意識到東南亞對其物資補給與戰略佈局的重要性時，遂把冷戰焦點轉移到東南亞區域，形成了左右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競爭，連帶地對馬來與馬華文學生態構成衝擊。

1950年代初，在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影響下，馬來文壇出現左傾的文學組織——「50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冷戰的介入進一步引起了該組織內部的分裂，終而掀開「文藝為社會」抑或「文藝為文藝」之論爭。

在馬華文學場域，《蕉風》雜誌在創刊初始便打著「純馬來亞化」的口號，就「馬來亞化」課題與新馬左翼文化界展開話語競爭。《銀星》副刊繼之與左傾現實派作者爆發論爭。本文欲釐清兩個文學場域的筆戰所觸及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問題，並嘗試了解文化冷戰如何主導論戰方向，以及它如何形塑馬來與馬華文學的發展軌跡。

關鍵詞：冷戰、馬華文學、馬來文學、筆戰、文化思想鬥爭

## Abstract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witnessed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t had evoked the aspiration of the local peoples to establish a newly independent nation. Furthermor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l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anyang split into pro Communist and pro Nationalist factions. At this juncture, the Malay ethnic was putting their effort in pursuing a new nation through nationalism ideas and thoughts. With the contestation of various forces, the British colonial was forced to hand-over the power to the right-wing element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colony. From the leftist point of view, this was perceived as a move of neo-colonization, therefore they turned to arm struggle again. In 1949, United States began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outheast Asia to its material supply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The shifting of the Cold War to Southeast Asia eventually led to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testa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ideology. This situation had brought a profound impact to the Malay and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in the country.

The impacts of the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he early 1950s had trigge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ft-leaning literary organization in Malay literary circle, namely “The 1950s Writers Group” (Angkatan Sasterawan 50).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ld War also had caused a cleavage within the writers of ASAS 50,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polemic over the slogan of “Art for society” or “Art for art sake”.

In the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ry arena, the newly published magazine in 1955, called *Chao Foon* proposed the slogan of “Pure Malayanization”, and had created the contestation with the left-wing cultural community over the discourse. Later, a literary supplement called *Yingsing* also set off the polemic between socialism-realist and modernist writers.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entioned in the polemics in both literary streams, and try to understand how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ld War domina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polemic, and how it shaped the trajec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 as well as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Keywords:** Cold War,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Malay literature, Polemic, Cultural thought struggle

## 一、前言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改變，美國與蘇聯崛起為東西方兩大強權，兩大陣營在軍事上的競賽與諜報戰愈激烈，冷戰於焉形成。此時英帝國勢力衰退，戰後企圖重返殖民地。面對當地人民的抵抗，尤其是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殖民政府面對來自左翼與共產勢力的強烈反抗。右翼精英階層受左翼獨立鬥爭的壓力，也參與到爭取獨立建國的運動中。約言之，戰後十餘年，新馬英殖民政府不斷面對左右翼民族主義勢力的抵抗，而這種現象發生於各族群之中，雖然它們之間的互動與交往並不密切，但鬥爭的目標——爭取脫殖與獨立，把他們推上了同一個歷史軌道。

這導致新馬兩地的自治與獨立運動更為複雜。一方面是民族主義獨立抗爭，另一方面又出現左右對立的局面。這種現象在文化與文學領域特別顯著。文學成為了兩個陣營交集與交鋒的場域，冷戰與筆戰同時發生，形成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普遍現象。本文將以馬華與馬來文學兩個語文源流的文學論戰為焦點，探討冷戰如何左右文學筆戰以及馬華與馬來兩個文學源流回應冷戰的姿態。

馬華文化界左右陣營的論爭並非遲至1960年代初才開始，實際上發生得更早。大約於1950年代中晚期已見端倪。香港友聯出版社於1954年南渡新加坡設立分社，翌年創辦《蕉風》雜誌。1959年1月1日《星洲日報》新年特刊刊登一篇署名天風（1958/01/01）的長文〈論建立馬來亞文化〉，反映左翼的觀點，討論當時文化界關心的馬來亞化課題。《蕉風》在創刊前幾期，亦討論「馬來亞文藝」課題。從「馬來亞化」到「馬來亞文藝」，左右兩個文化陣營各自表述，其中的冷戰因素再顯著不過。

政治上，本時期的新馬獨立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馬來亞於1955年7月27日舉行第一次獨立前全半島立法議會選舉。分別代表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的政黨：巫人統一機構（巫統）、馬來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民大會黨（印度國大黨）組成聯盟參與選舉，獲得五十二席的五十一席。英殖民政府亦同意組成內閣。新加坡則於1959年取得自治

地位，爲了進一步取得獨立，聯盟政府於1955年與被英殖民政府視爲首要敵人的馬來亞共產黨舉行會談。<sup>1</sup>會談目的在於勸降與和解，不排除東姑（Tunku Abdul Rahman）有意通過這次會談向英殖民政府施壓，搶在左翼之前取得獨立。顯然，馬來亞左右兩派在爭取獨立建國的問題上產生明顯的分歧，而冷戰進一步加劇了兩個陣營的對立與競爭。

## 二、1950年代東南亞冷戰戰略的制定

美國的文化外交始於二戰前夕，主要是爭取外國民心。它首先是由民間團體推動，美國政府只負責居中「協力促成」（facilitate）與「協調」，而不直接介入。美國於1953年杪至1954年開始便相當關注東南亞華人的動態並且專門製訂對華人的政策。美國對新馬初期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東南亞華人被中共滲透。具體方法以強硬手段，如搜查、逮捕、拘留、驅逐出境，甚至射殺嫌疑者（莊華興2019/05/20）。1950年東南亞十個地區<sup>2</sup>的華裔人口占東南亞總人口6%，共966,000人。龐大的人口數量讓美國擔憂東南亞華人成爲「第五縱隊」爲中國共產黨所用，並對亞洲國家進行滲透與顛覆活動。其次是讓華僑作爲美國對臺政策的擁護者。冷戰開始後，美國對東南亞的華僑政策由美國聯邦政府直接參與。國務院文化關係組的任務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結合，國會先後通過傅爾布萊特法案（William Fulbright Act）、美國新聞與教育交換法案<sup>3</sup>，以及1948年1月通過史墨法案。此法案的確立標誌著冷戰正式掀開序幕，因應東南亞華人而製定的政策隨之陸續出現。

---

1 殖民政府1952年5月1日於英文《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封面登載新聞懸賞二十五萬元（相等於今日一百萬令吉）拘捕馬共總書記陳平，英文標題爲：“NOW IT'S \$25,000 FOR PUBLIC ENEMY No. 1 — if brought in alive”，並刊出陳平人頭照。此外還印製通緝海報到處派發。

2 分別是泰國16.7%、馬來亞38.4%、新加坡78.1%、印度尼西亞2.9%、越南3.1%、柬埔寨和老撾7.1%、緬甸1.7%、菲律賓1.2%、砂拉越和文萊29.4%、北婆羅洲21.9%（Skinner 1950: 79）。

3 此法案由共和黨參議員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和眾議員墨得（Karl Mundt）針對美國對海外的文宣活動所提出。

首先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東南亞華人的情況進行分析。1949年初，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命人起草了《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51號文件。指出東南亞不僅是橡膠、錫礦、石油等重要原料的產地，而且是溝通東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對美國至關重要（張煥萍2016: 76）。隨後擬定了一系列對東南亞華人的政策。3年後，出臺了下列政策：

1952年，《美國新聞處對東南亞華人宣傳計劃》，提出宣傳的方針主要以反共宣傳為主，正面宣傳美國和「自由世界」為輔。（ibid.: 77）

1954年，《華僑華人與美國政策》，其中一項對私人機構提出的建議是「支持私人文化組織以抵抗共產主義的影響」。（ibid.: 77）

1956年，美國國務院發布《海外華人與美國政策》。文件分析各國的華人情況，並製定了對東南亞華人的政策，並大幅度推行文化冷戰戰略。（ibid.: 77）

1957年12月11日，行動協調委員會專門製定《對東南亞華人宣傳的指導方針》，其主旨是通過影響華僑抵制共產主義，降低中國的影響力和聲望。（ibid.: 77）

簡單來說，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策略從1950年代持續到至1960年代末期。1960年代後，隨著中國和美國意識到他們對海外華人的宣傳會直接影響自身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時（而且東南亞各國已開始製定促進華人融入居住國的政策），雙方的宣傳戰才逐漸平息。翟韜（2013: 117）把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戰略分三個階段，下文討論的冷戰前期即包括這段時間：（一）1949至1956年，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出臺。（二）1956至1962年，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反思和調整。（三）1962至1964年，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活動的式微。

冷戰進入第二階段後，美方改以柔性方式進行，最為人所知的是通過教育、文化與出版贊助。前者如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頒發的留學獎學金，後者為出版機構的資助與現代主義著作的翻譯與流通，論者稱之為「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下文試圖探討冷戰政策對馬華與馬來文壇形成的衝擊，並聚焦於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兩個流派的筆戰。簡言之，冷戰期間爆發的筆戰使馬華與馬來兩個文學源流發生某

種形式的交集。兩個文壇的筆戰幾乎發生於冷戰前期同一個時間點，並歷經冷戰從強硬到懷柔、綏靖的政策階段。隨著冷戰政策的轉折，馬華文壇左右兩派的對立益發尖銳，然馬來文壇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狀態。

### 三、馬華文壇筆戰的兩個陣地與其主角

馬華文壇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冷戰期」起源於《蕉風》。創刊後，該雜誌就已意識到它面對的敵意。雜誌在創刊前36期即打著「純馬來亞化文藝」的旗幟（1955/11/10-1957/4/25），顯然這是就「馬來亞化」議題與左翼刊物的相關論述進行抗衡。本時期美國採取強硬對抗手段的冷戰策略，《蕉風》創刊後即投入這場「戰役」，先是採取守勢。署名李亨的作者從第二至第四期一連三期分別談文學的本土化（〈此時此地的文學〉）、現代性（〈文學的現代性〉）、現實性（〈文學的現實性〉）問題。知微於第21期談文藝與現實的關係（〈文藝與現實〉），為《蕉風》的路線進行辯護。這些文章間接回應馬華寫實派視現代主義為西方舶來品的論調。

進入1960年，《蕉風》每期開始頻密介紹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作品與寫作技巧，間中偶向另一陣營發動攻勢或進行批評。1960年代最初幾年正逢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大力進行冷戰宣傳，中期後雖已漸趨式微，但華人群體中的左右陣營已成涇渭之勢，文革的衝擊更激化了這種情勢。1960年代前期的現代主義陣營代表是黃崖<sup>4</sup>，後期則以李蒼<sup>5</sup>為主，《蕉風》與《銀

4 黃崖，另署筆名黃隼、高揚、莊重、陸星、林音、葉逢生等，生於1932年，原籍福建廈門。1950年到香港，任《大學生活》半月刊編委與《中國學生週報》副社長。1959年南下星馬執行友聯機構編輯任務，大約於1960年接編《蕉風》，同時任《學生週報》編輯，1969年離開《蕉風》並自創綜合性雜誌《星報》週刊。他早期寫詩，後來轉向小說，已出版多部長篇小說。1992年逝世於曼谷。

5 李蒼，本名李有成，出生於馬來半島北部吉打州一個漁村。早年在檳城鐘靈中學接受教育，開啓了其文學啓蒙，參與了檳城的文社。中學畢業後受白垚之邀，南下八大打靈再也參與《學生週報》和《蕉風》的編輯工作，他早年的一些詩作見於本時期的《蕉風》。1969年秋離馬赴台深造，此後逐漸淡出文壇，專注於學術研究，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以及多所大學合聘

星》週刊分屬其陣地。左翼陣營則以思奇、黎山等人為代表，以《浪花》和《半山月刊》為陣地。<sup>6</sup>由於參與論戰的左翼作者群出現不同的且少用的筆名，其背景實難以掌握，故涉事的刊物比人物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黃崖接任《蕉風》主編後不久，以不同筆名積極引介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和作品，介紹現代文藝欣賞與技巧。茲按照時間順序把資料列於後：

1. 葉逢生。〈《簡介艾略特和《荒原》〉〉，<sup>7</sup>《蕉風》1961年5月，第103期。
2. 林音。〈伍爾夫夫人〉，《蕉風》1961年7月，第105期。
3. 莊重。〈悼海明威〉，《蕉風》1961年8月，第106期。
4. 林音。〈文壇奇人——康拉第〉，《蕉風》1961年9月，第107期。
5. 莊重。〈威廉·弗克納〉，《蕉風》1961年10月，第108期。
6. 莊重。〈湯瑪斯·曼〉，《蕉風》1961年12月，第110期。
7. 林音。〈悼福克納〉，《蕉風》1962年8月，第118期。

同時，黃崖也介紹現代文藝欣賞與創作技巧，並為現代主義文學辯護，包括：

1. 葉逢生。〈新時代新觀點——淺談欣賞現代文藝〉，《學生週報》

---

教授。退休前後，他重新執筆寫詩與馬華文學評論。

- 6 自馬、泰與馬共三方於1989年簽署合艾條約後，本區域的共產主義武裝活動宣告結束。隨之出現左翼人士的回憶錄、口述歷史檔案、冷戰解密文件，以及有關馬來亞共產黨的各語文研究。馬共相關文獻、回憶錄與研究書籍除了在馬新兩地出版，部分也在香港出版。逐年遞增的出版量彌補了冷戰期間出於政治正確的官方論述以及有意無意被隱藏或掩蓋的真相。有關馬共研究的回顧可參何啓才（2013/06）〈馬來亞共產黨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在馬華左翼文學研究方面，有謝詩堅（2009）根據博士論文出版《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其餘有莊華興、潘婉明的論文。謝詩堅著眼於左翼文學發展談橫跨四十年的馬華左翼文學，提供了頗為豐富的史料，缺點是分析框架受影響論限制，無法釐清馬華左翼文學在某些歷史階段與中國左翼文學的互動與關係。易言之，在影響論命題下，馬華左翼文學始終處於被動的位置。以「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為例，金枝芒提出書寫「此時此地」雖無甚新意，亦非意識形態鬥爭路線的分歧，同時預見了中共掌握實權前對馬華左翼小文學系統的專斷思維，金枝芒給沙平的回應無非反映了馬華左翼文學在戰後初期萌芽的自主性意識（莊華興2005）。在影響論之下，這些思考都不太可能，謝著的最大問題可見一斑。
- 7 實際上，新加坡的梁明廣早於1960年11月27日於《南洋商報·文化》著文引介艾略特，題為〈艾略特和他的詩〉。

第252期。

2. 莊重。〈談意識流〉，《蕉風》1961年6月，第104期。
3. 黃崖。〈談現代文學〉，馬大《斑苔學報》1968/69，第3期。
4. 莊重。〈我們應有的了解〉，《蕉風》1962年6月，第116期。
5. 葉逢生。〈文藝作品的價值〉，《蕉風》1962年7月，第117期。
6. 莊重。〈談文藝批評〉，《蕉風》1962年10月，第120期。
7. 莊重。〈永恒的存在〉，《蕉風》1963年2月，第124期。

黃崖在《蕉風》介紹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之際，寫實派也在其刊物抨擊某些西方現代主義作者。譬如黎山的〈論艾略特的詩——談詩與詩人〉與〈論艾略特的詩〉，分別刊於《半山月刊》第5期（黎山1964/06/10）、第6期（黎山1964/07/15）。以上二文為上下篇，作者給現代主義作這樣的詮釋：「現代派寫作者們在理論上所強調的『個體心靈』x『個體思想』以及不做社會的『傳聲筒』都是一種粉飾原來面貌的虛偽面目罷了。在表面上，他們好像『與世無爭』的『個體思想』的支持者；實際上，他們的思想是脫離不了社會的。只要他們還是活著的時候，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是和社會有關。做了虧心事的人通常都要把自己打扮一下，讓人們看得順眼些。買賣毒物的人們也可以念經念佛或者叫幾聲阿門。不是嗎？艾略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ibid.: 7）

1963年開始，以《蕉風》為陣地的馬華現代派開始正面回應寫實派的攻勢，終於引燃了筆戰的火苗。參與的作者，除了黃崖本人也包括其他作者。查本時期《蕉風》的筆戰文章包括：

1. 莊重。〈所謂反映現實與表現個人〉，《蕉風》1962年12月，第122期。
2. 高文。〈現實主義的陷阱〉，《蕉風》1963年1月，第123期。
3. 陸星。（黃崖）〈為現代文學申辯〉，《蕉風》1963年5月，第127期。
4. 江靜。〈現代文學的缺點〉，《蕉風》1963年6月，第128期。
5. 天兵。〈某先生抵得上半個馬華文壇〉，《蕉風》1969年1月，第195期，頁5。

6. 忙人。〈我所知道的觀止先生的寫作動機〉，《蕉風》1969年1月，第195期，頁6-7。

同年9月，黃崖以《蕉風》主編的身分召開文藝座談會，頗有宣示立場傾向的意味。座談會集合多位有共同立場與觀點的作者，門戶與派別於焉已成。黃崖雖於1969年離開《蕉風》，然時至1970年8月《蕉風》所主辦的座談會仍沒有脫離筆戰的話語氛圍。座談會記錄分別為：

1. 編輯室。〈我們的基本信念〉，《蕉風》1963年9月，第131期。
2. 編輯室。〈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蕉風》1963年11月，第133期。
3. 編輯室。〈馬來西亞的文藝讀者與作品〉，《蕉風》1966年9月，第167期。
4. 編輯室。〈馬來西亞文學〉，《蕉風》1966年11月，第169期。
5. 編輯室。〈青年作者與馬華文壇〉，《蕉風》1967年2月，第172期。
6. 編輯室。〈這一群人，說東說西的〉，《蕉風》1970年4月，第209期。
7. 編輯室。〈創作的良心與自覺〉，《蕉風》1970年8月，第212期。

黃崖在《蕉風》雜誌所做的現代主義文學工作，從引介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介紹現代文學欣賞與創作技巧；再到正面回應寫實派某些對現代主義的批評與觀點，最終引起了寫實派的回嗆。這時候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活動逐漸緩和，轉而走懷柔路線，東南亞國家亦積極推展移民融入當地的政策。表面看來冷戰已趨緩，但文革的極左思想卻在此時衝擊著新馬華人文藝圈，馬華左右陣營的對立反而進一步加劇。馬來聯邦的左翼這廂先有《半山月刊》雜誌，一年後出現《浪花》雜誌，新加坡《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的作者（如鍾祺）也在此時參與了論戰。新加坡《現代文藝》第4期發表火華〈向現代派展開「猛攻」的時候了〉的短文，點燃了寫實派和現代派的論戰。文章開篇提到：「現代派總算『蓬勃』起來了。組織現代派團體、辦刊物，建立現代派文藝理論體系，打擊現實主義，這一切都在現實主義文藝遭受人為的壓制與阻礙的情形下才可能的。」（火華1965/02/05: 1）文中的「人為的壓制與阻礙」，顯然是指1950年代到

1960年代初，美國冷戰策略對左翼文藝的「壓制與阻礙」，以及對現代派文藝的扶持，具體如50年代中期以後施行的美元文化攻勢。作者以尖酸刻薄的語言貶低現代派文藝，卻無法在理論上與現代派信徒們展開論辯。

從1965至1967年受文革的衝擊，寫實派對現代派的批評愈形猛烈。奇思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刊物《浪花》<sup>8</sup>第15、17期先後發表〈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和〈當前馬華文藝的鬥爭〉。前者從社會現實主義角度批評現代主義者把其作品視為揭示「心靈」的「最隱蔽處」的說法：「關於這一點，我們要說，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抽象的心靈，只有具體的心靈，沒有超現實或超階級的『心靈』，而只有具體的、現實的、深深打著階級烙印的『心靈』。」（奇思 1967/03/10: 19）

現代派陣營並不示弱。1965年年杪，檳城青年作者李蒼和寫實派產生正面的交鋒。如果黃崖在《蕉風》的文章重點在介紹與推廣現代主義寫作，或說以守勢為多；李蒼的姿態則是激進、堅決的。在〈掀起馬華現代詩的狂飆〉，新現實主義作者被視為野孩子（李蒼1967/03/01: 2）。不過，李蒼是對馬華現代詩進展「蹣跚」表示憂心的一位自覺青年作者。以下為其論戰文章：

1. 李蒼。1965/11/01。〈葡萄是酸的嗎？〉，《光華日報·銀星》第11版。
2. 李蒼。1965/12/06。〈幾個問題的討論——致思湖先生〉，《光華日報·銀星》第11版。
3. 李蒼。1967/02/21。〈迎馬華現代文藝〉，《南洋商報·綠原》

---

8 在60年代馬華文壇的筆戰中，主要的戰場在《浪花》雜誌和《蕉風》雜誌。《浪花》創刊於1965年7月1日，1967年12月10日停刊，共23期。它的創刊正值中蘇交惡、中印邊境衝突、臺灣國民黨伺機反攻，以及中越爆發邊境戰爭，一時之間，中共陷於孤立無援境地，促成中共於60年代中以後走向極左路線。馬來亞共產黨此時獲得毛政權協助，在湖南益陽山區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向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此時，部分左翼青年受感召上山參與馬共游擊戰，留下來的則嘗試辦刊物，《浪花》（以及《半山月刊》）即在此時出版，不過，受官方的嚴密監控，兩份雜誌的壽命都不長。《蕉風》創刊於1955年末，一直出版至488期方休刊。前者代表的是左翼刊物，後者則標榜現代主義，雖然它在創刊初期並不現代。除了雜誌，其他戰場包括華文報副刊，如《南洋商報》的副刊〈文藝〉和〈青年園地〉。

（北馬增版）。

4. 李蒼。1967/03/01。〈掀起馬華現代詩的狂飆〉，《文新月刊》第2期，頁2。
5. 李蒼。1967/06/01。〈我還要迎現代文藝〉，《文新月刊》第5期，頁4-5。

整個1960年代的論戰雖不間斷，然而，現代詩的崛起與寫作確也發掘了一群有才華的年輕作者：如新加坡的牧羚奴、英培安、零點零；馬來亞聯邦的李蒼、藍雁、秋吟、梅淑貞等。然而，1960年代星馬現代詩的寫作仍然深受臺灣現代詩的影響。黃崖於1960年代中期以前執編《蕉風》時轉載或刊登不少臺灣外省籍作家的作品，如劉藹如、葉珊、朱西寧、林北、聶華苓、劉念慈、皇甫光、羅門、林以亮、陸林、趙康棣、張默、痲弦、沈甸（張拓蕪）、吳望堯、王平陵、郭衣洞、蔡文甫、王敬羲、孟瑤、單子豪、周夢蝶、林苓、陳容子、謝冰瑩、郭良蕙、管管、墨人、桑品載、段彩華、馮馮、李輝英、叢甦等，本地作者的作品反而不多。這是「民國臺灣文學」的影響（莊華興2016; 許定銘2013），故難免成爲現實主義陣營批評的把柄：「星馬詩壇，尤其是在馬來亞的報刊上經常出現現代派詩，雖然有人夢想在這裡建立一個『臺灣第二詩壇』〔…〕但無論怎樣，現代派詩人的好夢是不會實現的，因爲此時此地有更多的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精神的詩人，一路來，他們本著『爲人生而藝術』的偉大目標，努力向詩的領域裡探討，俾使新詩臻至更完美的階段。」（疑冰1966/07/15）其中不無受冷戰意識形態矛盾所牽制，尤其在新馬華人社會，學習臺灣輕易地與擁護國民黨或擁護畫上等號，在左翼人士眼中，是腐化的象徵。弓長在〈對現代詩的一點期望〉一文中，對學習臺灣現代詩產生的幾個弊端提出反省，先是批評盲從臺灣現代詩，然後批評過於重形式、技巧而輕內容：

雖然，這些成就值得鼓舞，可是，這並非說我們的現代詩已深具風格與漸臻成熟，或具有獨立性。無庸否認，我們的詩至今還不能完全擺脫臺灣的影響，有些作者更無知地，盲目地拾人唾沫，爲人牽著鼻子迷而不自知〔…〕。

我們的作者專喜研究詩的意象，形式與語言的彈性等方面的技巧，卻忽略了詩的內容〔…〕在一些刊物上，可以普遍地發現我們的詩壇充滿一種頹廢與萎靡不振的現象，因爲我們的新詩的內

容非作愛情的歌頌即無病的呻吟，這種內容貧乏的新詩使現代詩壇蒙上一層陰影。〔…〕有一點很嚴重的是，許多初學者誤以為只要把名詞當形容詞用，及堆砌一些艱深的詞藻，加上一個不俗的題目，便是一首詩了。（弓長1968/02/09）

缺乏生活化的題材、愛玩弄文字與技巧恰也是寫實派評批者所極力撻伐的目標。以下臚列部分參與論戰的寫實派作者與其作品，內容主要突出文藝的時代使命以及對現代派文藝的批判，按照日期臚列於後：

1. 林綠（丁善雄）。1964/01/24。〈詩人與一首現代詩〉。《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第13版。
2. 鍾祺。1964/04/29。〈新詩的逆流——現代派〉（上）。《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第13版。
3. 黎山。1964/06/10。〈論艾略特的詩——談詩與詩人〉。《半山月刊》第5期，頁1-2。
4. 黎山。1964/07/15。〈論艾略特的詩〉。《半山月刊》第6期，頁6-7。
5. 鍾祺。1964/08/05。〈新詩的逆流——現代派〉（下）。《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第13版。
6. 火華。1965/02/05。〈向現代派展開猛攻的時候了〉。《現代文藝》第4期，頁1。新加坡：現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7. 疑冰。1966/07/15。〈從現代詩談到《談談詩歌創作》的出版〉。《星洲日報·青年園地》第16版。
8. 唐菁。1967/02/10。〈論「現代派」的使命〉。《浪花》第14期，頁12-14。
9. 奇思。1967/03/10。〈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浪花》第15期，頁18-19。
10. 毛求疵。1967/05/01。〈新文學運動有帶來藝術的革新嗎？〉。《文新月刊》第4期。
11. 奇思。1967/05/10。〈當前馬華文藝的鬥爭〉。《浪花》第17期，頁4-5。
12. 毛求疵。1967/06/01。〈時代和文藝思潮〉。《文新月刊》第5期，頁6-7。
13. 惜樓。1967/06/10。〈批判李蒼的歸〉。《浪花》第18期，頁20。
14. 孺子牛。1967/07/10。〈目的與示威——讀《迎馬華現代文藝》有感〉。《浪花》第19期，頁21。

15. 編輯部。1967/08/10。〈浪花二年檢討之一：文藝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鬥爭問題〉。《浪花》第20期，頁2。
16. 渾金。1967/08/10。〈高舉現實主義大旗，搞掉現代主義黑線——《浪花》的艱巨使命〉。《浪花》第20期，頁7。
17. 編輯部。1967/09/10。〈浪花二年檢討之二：文藝為工農服務問題〉。《浪花》第21期，頁2。
18. 葵花。1967/09/10。〈高舉義旗，聲討醜類〉。《浪花》第21期，頁4-5。
19. 魯素。1967/09/10。〈現代派作家的創作沒有目的嗎？〉。《浪花》第21期，頁13。
20. 鐵匠。1967/10/10。〈園邊集——偽現實主義的一部迷魂曲〉。《浪花》第22期，頁17-19。
21. 葵花。1967/10/10。〈當前文藝批判中的若干問題〉。《浪花》第22期，頁20-21。
22. 編輯部。1967/10/10。〈浪花二年檢討之三：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浪花》第22期，頁24。
23. 啓源。1969/10/15。〈略論現代現實主義基礎〉。《南洋商報·青年園地》第13版。
24. 觀止（方修）。1975/12/31。〈一九六八年的馬華文藝界〉。《文藝界又五年》，頁12-29。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大約同一個時候，新加坡也有一批年輕詩人，以《南洋商報·文藝》和五月出版社為中心寫現代詩、推廣現代詩，如陳瑞獻、南子、賀蘭寧、英培安、邱柳川等。《南洋商報·文藝》主編梁明廣也在自己主編的副刊刊登現代詩或小說。

白垚（2007: 82）把現代詩在馬華文壇的出現歸結到反叛行為。他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馬華文壇即有叛逆者揭竿而起，突破專橫，激發一場影響深遠的反叛文學運動〔…〕。」李有成（2019/02: 80）則把它稱作「逾越」：「60年代的馬華文學主流是寫實主義（其實是社會現實主義）〔…〕整個文學的生產場域幾乎為現實主義所壟斷。在這樣的文學意識形態之下，任何非現實主義的創作行為往往會被視為逾越。現代詩的寫作尤其如此。逾越挑戰原來清楚的畛域，侵犯原來的意識形態環境，使得原先的系統不再穩定。逾越將會帶來改變，這是任何權力階級所不願看到

的，也不允許的。」

李有成從生態學中的領地視角討論文學場域的占有與捍衛，呈現其中形成的競爭、取代、易主的現象。如果生物為生存的競爭源於繁殖與延續物種所需，李有成理解的「逾越」可以說源於意識形態競爭所致。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未見他討論時局如何主導／主宰場域行為。換句話說，戰後國際冷戰形勢在東南亞的擴張，以及它如何影響，乃至衝擊馬華文學生態，未見有論述。然而，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競爭確也促成文學系統的逾越、擴張與反擴張，不可忽視。

因此，在寫實派與現代派兩個陣營的論戰中，論述無不出現這個模式：抑制與貶抑對方，然後自我經典化，無論是在美學上或意識形態上。筆戰雖歷時多年，但重複性很高，討論的議題卻不多。現代派雖極力指責寫實派為政治服務，力陳我方為「文學」，實際上皆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掣肘。一方以社會現實主義為基礎，另一方深受資本主義體制追求個體化與自由主義精神的影響。由此可見，論戰終究是從各自的意識形態認知出發，交集、論辯不足，意氣之爭有餘。

#### 四、50年代冷戰氛圍與ASAS 50的撕裂

從1949-1956年，美國對東南亞推行的第一階段的冷戰戰略不僅對華人社群產生影響，對當地馬來社群也產生衝擊。在這個階段，美國原本在亞洲的宣傳主題從「宣揚美國」（揚美）轉為「反中共」（反共）。面對新中國咄咄逼人的宣傳攻勢，美方認為國務院不能像以前在中國大陸時那樣只是「敷衍和妥協」，而應該發動一場進攻性的宣傳戰來對付共產主義。方法是採取正面與反面兩種戰略，前者是「宣傳人類自由和民主生活方式的益處和福祉」；後者指暴露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不人道、表裡不一及其罪惡之處」（翟韜 2013: 119）。馬來文學的現代化，與「50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下稱ASAS 50）<sup>9</sup>以及新加坡、印度

9 ASAS 50於1950年8月6日創立於新加坡，為戰後最早的馬來文學組織。阿斯拉

尼西亞的地緣政治分不開。根據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馬來亞的馬來新文學應該從1948年作為起點（Usman Awang and A. Samad Said 1963: 81），這種說法顛覆了馬來文學史一貫以戰前1920年代為肇端的說法。

戰後短短三年間對馬來人的社會與政治思想造成巨大的衝擊。日軍投降不久，馬來人又面對英殖民政府推行的馬來聯邦憲制計劃（Malayan Union Plan），企圖摧毀以馬來統治者為中心的「傳統」政制，以鞏固殖民政權。1948年，英殖民實施緊急法令，正式向馬共與左派勢力宣戰。際此水深火熱時刻，馬來文學相繼湧現了一個又一個的年輕作者，<sup>10</sup>其作品雖青澀且帶著濃厚的浪漫色彩，但他們開始思考社會問題。譬如阿都·沙末·賽益德（A. Samad Said）的短篇〈期望成為思想家〉（Ingin Jadi Pujangga），是以ASAS 50關於「文藝為社會」還是「文藝為文藝」的辯論

夫（Asraf）和韓沙·胡欣（Hamzah Hussin）為創始人之一。1948年，半島施行緊急法令，活動受限，失業率高，不少半島馬來青年南下新加坡（其時新加坡不受緊急法令影響）謀求生計。其中大部分為知識青年。他們在新加坡馬來出版業、馬來報、學校做事。現存的ASAS 50文獻主要是第三屆馬來語文大會出版的《備忘誌：1962年第三屆馬來語文大會》（*Memoranda, 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Ketiga 1962*）。後來研究者除了參照此書，對於更多無法具體理解的細節，往往是從當年參與者的回憶錄、自傳或傳記尋求答案。其中有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 and A. Samad Said 1963）《馬來新文學的主題與任務》（*Tema dan Tugas Sastera Melayu Modern*）、克里斯·馬斯（Keris Mas 1979）《文學三十年：Keris Mas回憶錄》（*Memoir Keris Mas: 30 Tahun Sekitar Sastera*）、阿都沙末·阿末（A. Samad Ahmad 1981）《一扎回憶》（*Sejambak Kenangan*）、阿都·沙末·伊斯邁（A. Samad Ismail 1993）《A. Samad Ismail 新加坡歲月追憶》（*Memoir A. Samad Ismail di Singapura*）、默罕默德·拉茲·伊斯邁（Mohammad Raezi Ismail 1994）《Hamzah Hussein：馬來文化巨匠》（*Hamzah Hussein: Tokoh Budayawan Melayu*）。此外，當年在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深造，並與ASAS 50諸子密切往來的本科學生也留下一些記錄，譬如左翼學生賽·胡欣·阿里（Syed Husin Ali 1959）《戰後新加坡馬來語文與文學組織：以ASAS 50為專例》（*Pertubohan-pertubohan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di-Singapura selepas Perang Dunia II: khasnya ASAS 50*）。換句話說，現有的ASAS 50研究仍留下不少空白，譬如ASAS 50的左翼現代性問題、它與印尼左翼文化圈的關係、冷戰左右雙方對它的衝擊等，皆有待理解。

- 10 除了阿萬伊爾薩甘（Awamil-Sarkam）年級較大（三十餘歲），其餘都在二十餘歲之間，而且寫作產量非常高。如克里斯·馬斯、韓沙、吉米·阿斯馬拉（Jmy Asmara）、羅斯米拉（Rosmera）、馬蘇里·SN（Masuri S.N.）、馬斯（Mas）、阿都·沙末·賽益德（A. Samad Said）等，克里斯·馬斯和阿都·沙末·賽益德於建國後分別被選為馬來西亞第一屆（1981）和第四屆（1986）國家文學桂冠（Malaysian National Laureate），享有崇高的社會與文化地位，但他們是馬來左翼。由此，形成了馬來文化人、知識者如何在民族主義精神和左翼意識形態之間作權衡的問題。

為故事藍本，針對馬來知識分子的思想之不確定性寫成的，是為馬來知識界最早的反思，而它來自青年基進作者。ASAS 50的左翼現代性逐漸萌芽。

二戰期間，馬來報受印尼語的影響相當顯著，但同時也在讀者群中引起一些非議。譬如阿都·沙末·伊斯邁在日軍支持的報紙《馬來新聞》（*Berita Malai*）任職期間，有一次在電車上就聽到乘客對該報吸納過多印尼語詞彙的批評。<sup>11</sup>語言的影響通過左派文人傳入馬新馬來民族社群。印尼於1945年的革命運動中推翻荷蘭殖民政權取得獨立，對1940、1950年代新加坡的左翼馬來文化人產生巨大的鼓舞，他們熱衷向印尼詩人學習，尤其是新儒派（*Pujangga Baru*）的作品。在印刷上，當時日本人以印刷英文海峽時報的最先進印刷機來印刷《馬來新聞》和《昭南新聞》（*Syonan Shimbun*）。現代性輸入新加坡<sup>12</sup>馬來文學的源頭於此可見一斑。

克里斯·馬斯（*Keris Mas* 1979: 83）追憶道，當他於戰後在《馬來前鋒報》任職時，有朋友針對他鼓吹年輕作者學習印尼文學的作法斥責他破壞馬來文藝，但也有人寫信敦促他以自己在該報的影響力聘請印尼著名作家加入該報，可見其時此地馬來左右翼人士對印尼影響之不同態度。可以肯定的是，當時馬來作者對語言文學發揮鼓吹民族抗爭和獨立鬥爭精神，同時期待馬來語文最終獲得國語的地位之願望是一致的。在當時的馬來青年作者之間，似乎形成一支新隊伍，文學的現代化呼應著建國的訴求。由此

---

11 當時《馬來新聞》的總編為伊斯哈克·哈茲·默罕默德（*Ishak Haji Mohammad*），即馬來民族主義報人沙戈伯（*Pak Sako*）。

12 克里斯·馬斯（*Keris Mas* 1979: 52）在自傳中說，他在40年代三次（戰前1941、1942-1946、1947）南下新加坡，雖然三次起因不同，但最後都與文學有關。他甚至認為如果欲追溯馬來文學的發展，必然要結合新加坡，戰後馬來文學發展尤其如此。另外，半島馬來青年在新加坡的落脚處一般是Geylang Serai、Lorong Ungku Aman、Paya Lebar、Kebun Ubi等馬來地區。他們之中，有些純粹為了尋求生計，有些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出路與上升機會，1948年以後，馬來青年更為了逃避半島的戒嚴法令，到新加坡另謀政治出路。Kampung Jawa、Arab Street、North Bridge Road和Jalan Sultan因臨近成為馬來青年作者和政治青年會聚之地。在這地區周邊，既有馬來出版社如Royal Press、MIBS、Ahmadiyah Press等。新加坡也成為馬來廣播、出版與印刷、電影中心，提供了各行各業的工作，如新聞記者、作家、歌手、音樂人、電影明星、戲劇推動者等等。戰後新加坡在經濟、貿易和工業的發展，也直接帶動了當地的社會、文化發展，新加坡由此成為1950-1960年代的馬來文化中心並不出奇。

可見，ASAS 50在馬來亞建國方案上已有清晰的理念，它的馬來語文與文學抗爭帶有更大的宏圖，這是現代性色彩在這個組織的最早的體現。

馬來文化界的左翼—社會主義思潮體現在ASAS 50群體身上。阿斯拉夫（Asraf 1959）編選的馬來短篇小說集《鮮花怒放》（*Mekar dan Segar*）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上述文藝觀。他在導言中指出戰後新世代作家在追求革新或現代性的偏差：

二戰後幾乎所有青年作者確有意給馬來亞的馬來文學帶來某種革新，然無可否認的是在追求創新的當兒，有些作者只在盲目摸索，並沒有任何指導，以致引起人們的誤會，以為使用乖離正確語言規範的就是革新。（Asraf 1960: vii）

在語言的使用上，他批評部分新作家隨意／草率（*melulu*）、文字欠缺精確（*serampangan*）。無可否認，阿斯拉夫這一篇近9頁的長文是戰後馬來文學界重要的文獻與文化宣言，揭示了他對建設新馬來民族的具體要求，即培養新覺醒和負責任的生活觀，以體現獨立自由的情感和思想（*penjelmaan perasaan dan pikiran yang bebas merdeka*）。

早在戰前，ASAS 50的一些成員已開始體現出對馬來傳統生活方式的反叛，以及對現代生活的嚮往。譬如克里斯·馬斯於1940年自蘇門答臘西部伊斯蘭學院取得宗教學文憑，返回彭亨故鄉吉打里（Ketari）的宗教學校執教時，鄉民對他追求時潮，如喜歡看電影和穿短褲打羽毛球的行為頗為不悅。在日常交往上，他喜歡和鄉村青年混在一起，絲毫沒有清真寺神職人員（*lebai*）的規矩，令鄉村父老難以接受。可以看出，現代思想與價值觀在戰前的克里斯·馬斯身上已經萌芽，與當時鄉民迂腐、守舊的思想觀念格格不入。

在印尼文化領域中，印共領袖於1950年8月17日成立人民文化機構（*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簡稱LEKRA），推動社會現實主義文藝。同年稍早創立的ASAS 50受其影響頗深，克里斯·馬斯、阿都·沙末·伊斯邁、阿斯拉夫、烏斯曼·阿旺等年輕作者都有某種程度的左傾思想。這一年，美國為抑制印共—左翼勢力的膨脹，以及促使印尼向西方靠攏，向其提供四千萬美元的援助，進出口銀行也向其提供了一億美元的貸款（理查

德·梅森、高艷傑2012: 108)。翌年8月10日，蘇基曼政府宣稱印共密謀推翻政府，發動了對共產黨人的大規模逮捕，與美國在區域冷戰中推動的美援不無關係。

ASAS 50在創立初期發生了有關文學創作目的論的論爭，阿斯拉夫提出「文藝為社會」（seni untuk masyarakat）的創作理念。他陸續於1950年5月、7月、8月號《寶石月刊》以及翌年3月25日、9月16日的《時代先鋒報》發表文章，指出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最終將由普羅大眾主導。當時馬來文化對普羅大眾是陌生的，阿斯拉夫相信這種情況有一天終會改變，因此呼籲社會作好準備面對這個發展態勢。在思想辯證上，他相信透過科學的分析才能掌握社會的本質，文藝創作和科學亦無法分割。他也提到社會階級矛盾之間的因果關係，如果這層關係清晰可靠，它最終將給人們帶來覺醒。然而，他的論述沒有引起當時評論界的關注，反而是他的一首詩觸動了讀者的神經。這首題為〈天堂〉（Syurga）的詩發表於1950年3月號《寶石月刊》（*Mastika*）：

爲什麼 / 人們仍舊嘗試 / 在漆黑中 / 把不存的說成有 / 他們說 /  
他是萬能的創造者 / 連痛苦與磨難 / 都是他賜給的公正 / 你心甘  
情願 / 傾注全力 / 赴湯蹈火 / 不惜代價 / 偉大的造物主

僅僅是一份委托 / 俾使你沉睡 / 至你的身軀物化 / 只有一個空間  
維度 / 值得我們全體依賴 / 沒有別的世界 / 沒有天堂與地獄 / 醜  
惡的人間是地獄 / 平等的社會才是天堂 / 兩者擇一 / 且協手合力  
建設（Asraf 1950）

這首否定上帝存在且充滿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作品，立時引起《筆》和《新聞》雜誌作者的抨擊。阿都·沙末·伊斯邁則站在阿斯拉夫一方，提出反擊，爲其辯護。根據前馬來亞大學流亡學生領袖希山慕丁（Hishamuddin Rais 2014/04/23）在〈1974年11/12月華玲〉（Baling November/Disember 1974）一文揭露，阿都·沙末·伊斯邁實際上是馬來亞共產黨地下成員。他於1976、77年之間被當局逮捕入獄，其時澳洲共產黨設法要求當局把他釋放。當時在澳洲流亡的希山慕丁從澳共發放的新聞中得知阿都·沙末·伊斯邁在馬共的名字叫翟納 / 萊納茲（Zainal/Lainaz），這個名字的諧音接

近列寧（Lenin）的名字。<sup>13</sup>

在這場論戰中，最有代表性的另一方是韓沙·胡欣。他注意到阿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傾向，並提出「文藝為文藝」（*seni untuk seni*）的理念，因論述不力、寡不敵眾，最後他選擇脫離ASAS 50，另組「馬來新作家行列」（*Angkatan Penulis Melayu Baru*）。多年後，在接受研究者的訪問時，他表示當年只想建立一種自由的創作心靈，卻被指責自甘淪為殖民—帝國主義的幫兇。他於1954年加入陸運濤與富商何亞祿成立的馬來電影公司國泰—克利斯影業（*Cathay-Keris Studio*）成為編劇與共同出品人，撰寫了多部以馬來歷史人物和民間怪談為題材的電影劇本（如《油鬼子》〔*Orang Minyak*〕、《吸血鬼妖》〔*Pontianak*〕）而一舉成名。無論是從陸運濤個人教育背景或電懣電影所走的好萊塢式的時裝片、歌舞片、都市喜劇，以及以中產階級觀眾定位的電影來看，明顯帶有資本主義的價值與趣味。韓沙·胡欣選擇加入國泰克利斯而非邵氏兄弟旗下，結合冷戰氛圍高漲的1950、1960年代來看，他和阿斯拉夫的論戰背後，說帶有意識形態之爭亦不為過，而這與冷戰大背景是無法分割的。從中亦可看出馬來文化文學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因應特殊的時代問題。約言之，ASAS 50同仁，無論左右，皆以意識形態作為達到民族自覺／自決的載體，而非終極目標。

## 五、冷戰中的馬來文化思想鬥爭

自左翼政黨馬來國民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及激進組織青年覺醒隊伍（*Angkatan Pemuda Insaf*）被英殖民查封以後，一部分失去領導的馬來左翼青年加入巫統，反對殖民者推行的馬來聯邦憲制計劃，這一批人士反對英殖民按照出生地主義法規（*Jus Soli*）給華人及其它非馬來人頒發

---

13 50年代，阿都·沙末·伊斯邁和李光耀創辦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後來與李光耀分裂，1958年加入吉隆坡《每日新聞》服務。1988年獲國家新聞人物獎。不少人曾獲他指導，包括克里斯·馬斯、馬茲蘭·諾丁（*Mazlan Nordin*）、蔑蘭·阿都拉（*Melan Abdullah*）等，他們後來都成為本地馬來文學與新聞界的知名人物。

公民權，其民族主義色彩至為鮮明。另外一部分馬來左翼青年以驅逐殖民主義者，爭取獨立為首要目標，同時也注意到當時華人開始對馬來亞產生政治認同，並參與獨立建國鬥爭。這一批馬來左翼分子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多元族群的馬來亞社會尋求團結統一以爭取獨立。他們提出了幾個方案，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建議以包容性的馬來民族觀念意識為基礎，尋求民族的團結與統一。易言之，這個包容性的馬來民族可以包含非馬來人，馬來語則作為團結馬來民族（Malay）的基礎。此時，馬來語文不僅僅作為溝通工具，也作為文化基礎。自1950年代中往後十年，我們看到星馬華人無不熱衷學習馬來語文。南洋大學從創校之初學生自發性開辦馬來語學習班到校方正式開辦馬來語文課、馬來文學作品的翻譯和文化習俗的譯介、雙語書刊雜誌的出版，學習馬來語風氣一時鼎盛。華-馬兩族文化人的互動亦頗為頻密，可見當時馬來亞華人對成為新國民熱切期盼之一斑，建國熱情顯然超越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熱情。這種情形大致維持到60年代中晚期。「五一三」事件以後，左翼政黨勢力因面對執政者的強力打壓而式微，以巫統為主的國陣勢力愈見穩固，馬來-土著主義觀念抬頭，之前自覺與自發性的華-馬文化交流已不復見，華社在各領域的生活轉為退守與防衛姿勢。當然，這和政治形勢變化對華人愈形艱難的困境不無關係。

獨立前的馬來政治勢力雖處於剛起步階段，經濟上亦不如其他民族，但把語言文化作為建國之本的觀念卻毫不含糊。這與馬來人自戰前1930年代即已存在的文化思想政治或文化思想鬥爭（*fikiran politik kebudayaan*）相關。這股思潮以左翼新青年（*Kaum Muda*）為核心，與保守的伊斯蘭教長者／保守派（*Kaum Tua*）形成對立之勢。戰後，馬來新青年主要由傳統庠肆（*madrasah*）教師、英殖民政府機關文員、作家、記者和編輯組成，他們通過筆桿，鼓吹民族意識的覺醒。馬來人自戰前接受左翼政治以後，民族自覺意識進一步提升到民族自決訴求，然而，左翼政治僅僅作為這個過程的載體（*vehicle*）或催化劑，它的核心內容依然脫離不了民族意識。這是戰後二十餘年間，正當馬來亞各民族面對錯綜複雜的三個鬥爭（即獨立建國鬥爭、族群政治鬥爭以及配合殖民政府厲行的反共鬥爭），馬來民族主義鬥爭主導當時馬來亞政治發展的進路，馬來文化思想鬥爭可說發揮

了決定性的作用。其思想核心是成立包含各民族在內的大馬來國（Melayu Raya），並把其他非馬來人包含在馬來民族（Melayu/Malay）內，馬來語作為各族的共同語。不難看出左翼馬來人這套理念呼應著印度尼西亞建國模式，左傾的ASAS 50成員基本上也抱持著這個立場。當時華人以爭取公民地位為先，普遍上也準備做出一定程度的文化調適以融入馬來亞新生國。新馬華社於1950年代提出馬來亞化（Malayanization）新文化概念時，顯然比左翼馬來人的文化思想鬥爭滯後十餘年。後來殖民者對左翼勢力的強力打壓及隨後的區域局勢變化，民族身分想像從馬來人轉向馬來亞人（Malayan people）。然而，對左翼馬來人而言，後者融混了外來因素與意志，特別是殖民者的意志，跟他們所倡導的馬來人概念不可相提並論。到此，馬來左翼鬥爭被迫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發自左翼勢力的文化思想鬥爭在這階段對封建忠君思想提出反省，這是馬來文化現代化的表徵。當中的領導人包括賽·謝·阿爾哈迪（Syed Sheikh Al-Hadi）、布漢努丁·阿爾希密（Burhanuddin Al-Helmy）、沙戈伯、ASAS 50作家同仁等，他們的身分有出版家、作者、記者和編輯。他們的寫作帶有鮮明的反保守宗教思想如賽·謝·阿爾哈迪，以及後三者的左翼民族主義思想。

## 六、總結

溫任平於1980年代回顧前二十年發生在馬華文學場域的論戰的總結頗能說明事實：

文學思潮的歧異即繫乎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孰佳孰劣這個死結上，由於雙方是在論戰，而非心平氣和地在理論上互相印證，互通有無，其意義似乎不大〔…〕不過，由於兩股文學思潮相互激蕩，有競爭才有進步，對雙方面作品素質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在彼此企圖說服或駁倒對方的過程中，現實主義的作者群意識到加強文學技巧的需切，以減輕來自彼方的詰疑；現代主義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題方面從個人走向社會，以消弭來自對手的責難。這樣一來，兩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學考慮下自我修正與改善。60年代以來的馬華文學之能夠在質地、內涵及表現方面漸

具規模，這兩股文學思潮的互為沖擊砥礪確曾無意間扮演了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溫任平1981: 4-5）

溫氏沒提到的是現代主義陣營的「自我經典化」對往後單一的審美品味的養成以及對文學史寫作的影響。

在馬來文壇，論戰謹守在文學的美學與功能上的辯論，談得也比較深入。然而，到了某個臨界點，政治話語便介入，如韓沙·胡欣指控阿斯拉夫受共產主義所滲透。

ASAS 50的筆戰除了從意識形態論文學功能，往後其成員亦參與馬來民族主義問題的探討；馬華文學筆戰不僅涉及意識形態，另有反西化的傾向，而且比馬來左翼更為明顯。相對而言，冷戰對馬華文壇的沖擊確實比較大，1950年代先有強力反共到文化冷戰的懷柔策略，再到1960年代中期文革潮的衝擊，一再揭示冷戰與意識形態鬥爭在馬華文壇所起的作用。冷戰對ASAS 50的衝擊與印尼的政治變化有很大關係，惟時間並不長，當馬來亞與印尼各自獨立建國，冷戰下的意識形態對立很快由民族主義思想所取代。

冷戰的介入把意識形態之爭帶入馬華與馬來文壇，最終引發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派別之間的筆戰。在呼應1950年代中晚期的馬來亞獨立建國，馬華左右兩派寫作人的頡頏先是出現在新興國的新文化建設之上。戰後不久，馬華左翼文化人首先在《星洲日報》提出「馬來亞化」或建設「馬來亞文化」之課題，並認為它包含各族優秀的文化元素且具有進步的意義。當香港友聯於1950年代中期南下新加坡設分社以後，開始就前述課題進行討論，並強調論述出發點之純性，此無非指向左翼文化人論述之不純或受意識形態主導（莊華興2016: 17-18）。當《蕉風》於1960年代初開始鼓吹現代主義創作後，馬華左右翼的頡頏與競爭進一步擴大至寫作界。隨著美國在東亞與東南亞文化冷戰的佈局愈趨白熱化與文革熱潮的衝擊，筆戰愈演愈烈，幾乎籠罩著整個1960年代的馬華文壇。

戰後的ASAS 50內部發生的筆戰雖也涉及意識形態爭執，但雙方念茲在茲的無非是自戰前1920年代伊斯蘭復興以後遵行的信念：延續未竟的民族主義建國理想。筆者注意到，無論是左右翼文人、知識者或意識形態不明

顯的宗教師（ustaz），<sup>14</sup>三者不約而同的鬥爭目標是爭取獨立建國與「復國」想像，即恢復或承襲15世紀馬六甲王朝與其榮光。對馬來文人、知識者與宗教師而言，建國即「復國」，兩者沒有絲毫衝突。至於華人左翼與右翼，爭取的僅僅是獨立建國，馬來亞新興國是他們追尋的目標，「馬來亞化」或「馬來亞文化」是他們的文化與身分想像。兩者的目標縱然有異，但政治意識形態最終導致華人左翼和馬來左翼走到一塊，華人右翼人士則選擇與馬來右翼進行合作，共享的政治意識形態讓他們把差異擱置一邊。這就埋下了獨立後有關建國路線／方案——馬來（西）亞是單一民族國家還是多元民族國家——的爭論。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弓長（Gong, Chang）。1968/02/09。〈對現代詩的一點期望〉“Dui xiandaishi de yidian qiwang” [Some Expectations for Modernist Poetry]，《南洋商報·文藝》*Nanyang Shangbao, Wenyi* [*Nanyang Siang Pau, Literature*]，第12版 [Page12]。

天風（Tian, Feng）。1958/01/01。〈論建立馬來亞文化〉“Lun jianli Malaiya wenhua” [On Establishing Malayan Culture]，《星洲日報·新年特刊》*Xingzhou Ribao, Xinnian Tekan* [*Sin Chew Jit Poh, New Year Special*]。

火華（Huo, Hua）。1965/02/05。〈向現代派展開猛攻的時候了〉“Xiang xiandai pai zhankai meng gong de shihou le” [It's Time to Launch an Fierce Attack on Modernist Camp]，《現代文藝》*Xiandai Wenyi* [*Modern Literature*] 4: 1。

白垚（Bai, Yao）。2007。〈林裏分歧的路：反叛文學的抉擇〉“Lin li fenqi de lu: fanpan wenxue de jueze” [Divergent Road in the Woods: The Choice of Rebellious Literature]，收於氏著《縷雲起於綠草：散文、詩、歌

---

14 伊斯蘭教中的ustaz是指宗教導師，除了布道，他們經常上山下鄉為民眾講解宗教課題，廓清生活中面對的解惑。這些人分為被官方認可的持證者與獨立講道者，兩者都是中東與北非穆斯林國家（主要是埃及、約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學習歸國。在馬來西亞中文語境，宗教師已約定俗成指ustaz。本文中的克里斯·馬斯即為宗教師（ustaz）出身。

劇文本》*Lvyun Qiyu Lucao: Sanwen, Shi, Gejuwenben* [*Clouds Rise From the Green Grass: Prose, Poetry, Opera Text*]，頁82-84。馬來西亞八打靈再也（Malaysia, Petaling Jaya）：大夢書房（Big Dream Publishing）。

李有成（Li, Youcheng）。1967/03/01。〈掀起馬華現代詩的狂飆〉“Xian qi Mahua xiandai shi de kuangbiao” [Set Off The Hurricane of Malaysian Chinese Modern Poetry]，《文新月刊》*Wenxin Yuekan* [*Wenxin Monthly*] 2: 1-2。

——。2019/02。〈詩的政治：有關一九六〇年代馬華現代詩的若干回憶與省思〉“Shi de zhengzhi: youguan yijiuliuling niandai Mahua xiandaishi de ruogan huiyi yu xingsi” [The Politics of Poetry: Some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on Malaysian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 1960s]，《馬華文學批評大系：李有成》*Mahua Wenxue Piping Daxi: Li Youcheng* [*A Compendium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ry Criticism*]，鍾怡雯、陳大為（Choong Yee Voon, Chan Tah Wei）編，頁78-95。桃園（Taoyuan）：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何啓才（Ho, Kee Chai）。2013/06。〈馬來亞共產黨研究之回顧與展望〉“Malaiya gongchandang yanjiu zhi huigu yu zhanwa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Malaixiya Renwen yu Shehuikexue Xuebao* [*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29-43。

李蒼（李有成）（Li, Cang [Li, Youcheng]）。1967/06/01。〈我還要迎現代文藝〉“Wo hai yao ying xiandai wenyi” [I Wish To Welcome Modern Art]，《文新月刊》*Wenxin Yuekan* [*Wenxin Monthly*] 5: 4-5。

奇思（Qi, Si）。1967/03/10。〈對現代主義一些謬論的批判〉“Dui xiandai zhuyi yixie miulun de pipan” [Criticism on Some Fallacies of Modernism]，《浪花》*Langhua* [*Langhua Magazine*] 15: 18-19。

許定銘（Xu, Dingming）。2013。〈黃崖革新的《蕉風》〉“Huang Ya gexin de Jiao Feng” [The Innovation of Chao Foon Magazine by Huang Ya]。《香港文化資料庫》*Xianggang Wenhua Ziliaoku* [*Hong Kong Cultural Database*]。Retrieved from: [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12.html](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12.html) on Jun 25, 2019.

理查德·梅森、高艷傑（Mason, Richard and Gao Yanjie）。2012。〈冷戰初期美國與印尼關係中的中國因素分析〉“Lengzhan chuqi Meiguo yu Yinni guanxi zhong de Zhongguo yinsu fenxi” [The Chinese Factor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onesia in the Early Cold War]，《中共黨史研究》*Zhonggong Dangshi Yanjiu* [*CPC History Studies*] 9: 106-113。

- 莊華興（Chong, Fah Hing）。2005。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主體（性）論述的開展及其本質 “Mahua wenyi dutexing lunzheng: zhuti (xing) lunshu de kaizhan ji qi benzhi” [Controversy Over the Uniquenes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ubjectivity Discourse],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 *Shijie Huawen Wenxue Yanjiu [Journal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朱文斌（Zhu, Wenbin）編，頁15-32。北京（Beijing）：新星出版社（New Star Press）。
- 。2016。〈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 “Mahua (Minguo) wenxue yizhi: wenxueshi zai kancha” [The Republican Footprints Left Behind in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Revisited], 《臺灣東南亞學刊》 *Taiwan Dongnanya 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1(1): 7-30。
- 。2019/05/20。〈緊急狀態時期的驅逐出境法令〉 “Jinji zhuangtai shiqi de quzhu chujing faling” [Deportation Ordinance During the State of Emergency], 《當今大馬》 *Dangjin Dama [Malaysia Kini]*。Retrieved from: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76789> on May 20, 2020.
- 張煥萍（Zhang, Huanping）。2016。〈再論冷戰初期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戰（1949-1964）〉 “Zai lun lengzhan chuqi Meiguo dui Dongnanya huaren de xuanchuan zhan (1949-1964)” [The US Propaganda War Against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ld War (1949-1964): A Revisited], 《南洋問題研究》 *Nanyang Wenti Yanjiu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 74-85。
- 溫任平（Woon, Swee Tin）。1981。〈總序〉 “Zong xu” [Foreword], 《馬華當代文學選：第二輯（小說）》 *Mahua Dangdai Wenxuexuan: Dier ji (Xiaoshuo) [Selected Contemporar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馬崙（Ma Lun）主編，頁3-13。吉隆坡（Kuala Lumpur）：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 疑冰（Yi, Bing）。1966/07/15。〈從現代詩談到《談談詩歌創作》的出版〉 “Cong xiandai shi tan dao Tantan Shige Chuangzuo de chuban” [From Modern Poems to the Publication of *Discussion on Poetry Creation*], 《星洲日報·青年園地》 *Xinzhou Ribao, Qingnian Yuandi [Sin Chew Jit Poh, Youth Column]*, 第16版[Page 16]。
- 翟韜（Zhai, Tao）。2013。〈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演變（1949-1964）〉 “Meiguo dui Dongnanya huaren xuanchuan zhengce de yanbian (1949-1964)” [The Evolution of U.S. Propaganda Policy to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美國研究》 *Meiguo Yanjiu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 117-137。
- 黎山（Li, Shan）。1964/06/10。〈論艾略特的詩——談詩與詩人〉 “Lun Ai Lue

Te de shi: tan shi yu shiren” [On Eliot’s Poetry: Poetry and Poets]，《半山月刊》*Banshan Yuekan* [*Ban Shan Monthly*] 5: 1-2。

——。1964/07/15。〈論艾略特的詩〉“Lun Ai Lue Te de shi” [On Eliot’s Poems]，《半山月刊》*Banshan Yuekan* [*Ban Shan Monthly*] 6: 6-7。

謝詩堅 (Cheah, See Kian)。2009。《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Zhongguo geming wenxue yingxiang xia de Mahua zuoyi wenxue, 1926-1976* [*Malaysian Chinese Left Wing Literature: Its Influence by China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1926-1976*]。檳城 (Penang)：韓江學院 (Han Chiang College)。

## 二、外文書目

- A. Samad Ahmad. 1981. *Sejambak Kenang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A. Samad Ismail. 1993. *Memoir A. Samad Ismail di Singapur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 Asraf. 1960. *Mekar dan Segar: Bunga Rampai Cherita-Cherita Pendek Angkatan Baru* (Cetakan kedu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hamuddin Rais. 2014/04/23. “Baling November/Disember 1974,” in *Malaysiakini*. Retrieved from: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0848> on Oct 2, 2015.
- Keris Mas. 1979. *Memoir Keris Mas: 30 Tahun Sekitar Saster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Ketiga. ed. 1962. *Memoranda: Angkatan Sasterawan ‘50 dengan Lampiran Rumusan 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Ketiga* (edisi ketig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hammad Raezi Ismail. 1994. *Hamzah Hussein: Tokoh Budayawan Melayu*. Bangi: Institut Alam dan Tamadun Melayu, UKM.
- Skinner, G. William. 1950.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the Far Eastern Studies.
- Syed Husin Ali. 1959. *Pertubohan-pertubohan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di-Singapura selepas Perang Dunia II: khasnya ASAS 50*. Academic Exercise (B.A.),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 Usman Awang, A. Samad Said. 1963. *Tema dan Tugas Sastera Melayu Moden*. Kuala Lumpur: Penerbit Federal Berhad.